

作为公共生活技艺之道的政治哲学

元 光^{*}

〔摘 要〕 政治哲学不但显现于伟大著作之中,而且是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指南,成为对公共性商讨与争论的技艺之道。因此,当代政治哲学需要从理想彼岸的设计之思中解放出来。在公共生活中,政治哲学不仅是实然状态的反思与应然状态的解释,更是实现这种反思与解释的技艺之道。超越追求中立性政治真理的局限性,政治哲学需要为人的政治选择提供判断、决定、主张或服从的能力,这是它的实践性所在。这体现在:在超越追求客观共识的政治科学与追求最优结果的政治哲学之上的,是使人真正具备积极的批判思维能力、建设性的问题解决能力、完备的阐释能力、包容的沟通能力以及系统性的信息控制能力等为要件的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由此,政治哲学不再是空中楼阁,既揭示了政治事务的争辩本性,又实现了人在追求理想政治状态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智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公共生活;政治哲学;政治争辩;技艺之道;正义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物(政治理念与政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是关于政治生活本真的理性求索,是全面理解政治现象的追问,也是对政治行为原则等问题的批判性阐释。对政治事物而言,任何存在政治生活经验的领域都会产生技术性与理论应用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以通过多学科及相应的教育加以解决。不过,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法,政治生活对每个理性人都将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反思问题,而解决此类问题则离不开政治哲学。“政治里永远潜伏着政治哲学,等待时机浮出水面。”^①然而,假如政治哲学只是经典与精英的抽象思辨,那么它只是浪漫的乌托邦主义。事实上,政治哲学始终存在于政治争辩之中,是一种在政治争辩中以培养公共生活能力为目的的知识。“政治技艺,就是一种重新安排自然(包括人性自然)的东西:第一步是将它分解成最基本的单位,第二步是将它重新建构起来,使之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②具体而言,这种技艺至少包括理解的能力、表达理念的能力以及说服他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政治哲学还会不断提升人的理解力,创造政治事物的乐趣与政治美感,与形形色色的人顺畅沟通,实现对现实政治议题的广泛讨论,使人对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辨别性体验以及智识性兴趣。简言之,这种在政治争辩中超越追求中立性政治真理的局限性的政治哲学

^{*}元光,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21116。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公正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3CZZ002)阶段性成果。

①[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乔治·W·凯利:《政治哲学·美国政治思想》,朱晓宇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②[美]史蒂芬·B·斯密什:《政治哲学》,贺晴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68页。

被称为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它能够且必然会为人的政治选择提供判断、决定、主张或服从的能力,即“(人)获得……能力”(The ability to……)。

一、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技艺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哲学是人类自觉批判政治生活的哲学后果。对现实政治优劣的评价、对理想政治的定位及其对相关政治实践的权力反思等被认为是政治哲学批判性思考的典范。批判性思考超越了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是其本质与传统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①。而罗尔斯和福柯更加明确地指出“批判”是政治哲学的基础思维,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给公民传授关于个人和政治社会的某些理想观念来发挥这种(夯实民主思想和民主态度的基础)作用,在公民一生中某个重要的反思阶段发挥影响”^②,它始终在诊断,“诊断目前,就是说出目前的所是,说出我们的目前在何处不同于和截然不同于非目前,即我们的过去”^③,而政治哲学的当下使命也正在于此。在这里,批判有别于一般的批评,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技艺,批判性思考是具体的。

第一,逻辑性政治思考。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政治批评,批判性思考的基础是逻辑性政治思考。政治哲学崇尚的反思和质疑不是任意的,不因个人兴趣、情绪甚至关注点的变化而转移。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政治抱怨与牢骚。虽然这些政治抱怨与牢骚所表现出的情绪与关涉的问题是批判性思考需要关注的,但是它们并不同于批判性思考。因为政治抱怨和牢骚所运用的话语逻辑是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一贯的政治观点与审慎的逻辑方法的。判定政治哲学的经典文献的重要标准就在于其所进行的论述是否满足逻辑性政治思考的要求,要么创设一种逻辑化的政治批判,要么修正或调整政治批判的逻辑性。在现实中,即便是面对变幻不居的政治格局甚至是争辩的相对主义困境,逻辑性政治思考仍是政治选择的思维原点,使人们做出的价值判断能够建立在可以被解释的基础之上。简言之,只有逻辑性的政治思考才符合理性政治思辨的需要,甚至在人们缺乏政治共识时,逻辑性的政治思考也能确认政治理性的重要性,并维系政治共识的可期性。

第二,提出“真”问题。政治生活不存在于真空之中,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一切本质存疑的政治概念往往都披着普世真理的外衣。因此,所谓“真”问题,既包括了科学的问题,也包括了正确的问题。前者指向政治现象的本质,后者关涉政治现象的情境。人们大多知道苏格拉底的智慧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无知,却往往忽视了他具有准确发现问题的能力。面向求真的问题意识的实质是提出兼顾科学性与正确性的合理问题。历史上,任何激进政治的鼓动、动员甚至谣言也会提出问题,甚至将虚假问题合理化。因此,对政治事物意义的追求不是形式上的追求而是对真意义的探索。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是“人为”制造的,要么是一种行为后果,要么是一种意识活动。虽然这些问题具有客观性,但并不指向政治事物的真正意义。通过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批判性思考,人们所应具备的提问能力具体是指:质的厘清和界的确定。对于前者,诘问法是典型范例,特别是对于普通大众,“某些评价性真理没有关于评价性概念的本质的完全真理那么复杂,可以通过诘问法首先获得,一直保持它们的稳定性”^④。而对于后者,则为提问的效用性设定了边界,防止其陷入虚无或相对主义,即“人们如欲有所作为,必须注意两项标的——可能标的和适当标的;人们努力以赴各自的标的,尤应注意这些标的的可能性和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

②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答复萨特》,《世界哲学》2002年第5期。

④ [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程郁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1页。

适当性确实与本人的情况相符合”^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正确问题就是在寻找问题的合理性标准。

第三,辨明中心议题。政治哲学主要解决的是政治事物的意义问题。而政治事物的意义一般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即政治事物的语言现象与行动现象。语言和行动交织在一起,既丰富了政治事务的意义层次、内容与持续性,又为理解意义带来了双重伪装。对于前者,维特根斯坦就认为人类生活不过是“语言游戏”,在言语的意义之外不存在其他意义的存在形式,而词的用法决定词的意义,因此我们所要确定的只是语言游戏的规则。而后者则认为政治事物的关键在于“实践”,运动和变化是它的意义所在,因而维持合理的变化和平稳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哲学始终是一种模糊性思辨,优良政治生活的意义追索也一直寄身于争辩之中。作为公共生活技艺,政治哲学提供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要使每一个人具备在论辩中不断自觉地将中心议题从政治现象的语言与行动的包裹下呈现出来,进而将关于意义的论辩维持在指向本质、原因、内容、必然性、现实性的层面,而不局限于现象、形式、后果、偶然性与可能性中。在此基础上,面向更为具体的境况分析,批判性思考有助于人们从模糊数据得出精确结论,从而明辨争辩双方的诉求、权衡各自利益与相关诉求的共契度,并为评估提供充分准备。

第四,评估可选策略。政治事物随着经济社会特性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塑造了多元化的政治理念、观念和意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变革的速度、强度和波动程度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宏观政治架构、中观政治议程与微观政治问题同时存在,不同层次和水平的政治性可能方案多如牛毛。尽管包容是现代政治的精神气质,但是任意、无辨别、无立场的多元化必然背离对政治生活的意义追求。施特劳斯说:“所有的政治知识都是由政治意见环绕和点缀。……政治生活的实质由政治知识与政治意见的混合所引导。因此,所有政治生活都伴随着用政治知识取代政治意义的努力,这种努力或多或少是连贯而且艰辛的。”^②当然,政治家需要具备高度的政治知识、理解力、智慧与技巧。即便是所谓的“群氓”,也应该接受政治哲学的教育,在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训练中获得抵御意见强制与观念蛊惑的自觉意识,防止“私欲”干扰公共性判断,养成对可选策略产生审慎质疑的辩证评估能力。

最后,区分复杂关系。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哲学必须培育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应技艺。区分作为哲学基本技能——如,二分法或辩证法——旨在解决如何区分与怎样对待区分的问题。然而,政治哲学内部关于区分的态度是多元化的而且任何一种态度都意图实现相互弥合。从公共生活技艺的角度,政治哲学从三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具体的区分能力。其一,考虑他者的能力。政治哲学通过关于政治事物的争辩,特别是行为和话语层面的阐释、沟通与共同参与,使人们走出主体支配或优先的限制,培育了一种交往理性。这一能力使得人们获得了考虑他者的能力,“并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无疑并非知识通过家族相似性的网络而建立起相互联系,它们展示出了一切生活世界的共同结构。”^③其二,区分目标、原则与对象的能力。对于政治事物,不论是主张还是争论,都围绕目标、原则和对象而展开,但它们在表达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常常混为一体,从而造成了误解、误判、误动。因此,政治哲学能否发挥实际效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并且在什么程度上能把目标、原则和对象的区分引入人们“对一个宽广领域的诸问题的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之中”^④。其三,分别事实与价值的能力。这里的事实与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分范畴,而是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事实与价值。它们不是对以二分为条件的支配关系的判定,因为政治争辩中映现的无限繁复的情况以及支撑它的无限材料及其调整,并不是政治哲学的任务。政治哲学提供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不是过度的智慧,而是以政治价值的概念去理解存在的政治事物。正如黑格尔所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40页。

② [德]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③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78—379页。

④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初版序言第3页。

言,“每个人都有手指,能拿起画笔和颜料,但他并不因此就是画家。关于思维也是这样的。……,正确的思维是对事物的知识和认识,所以我们的认识应该是科学的。”^①

二、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是政治哲学的基础技艺

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确保自己是关于政治事物唯一正确的解释,非但如此,政治事物原本就是一个充满不同观点且能够在不同语境下产生不同反思成果的论域性对象。因此,争辩是不可避免的。与其执念于为政治哲学找到一个明确答案,不如将视角转向政治哲学究竟可以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做什么。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始终面向政治问题,应被理解为一种没有终点且持续解决政治问题的反思哲学。在这里,每个人都面对政治问题且“卷入”到经由思辩的政治实践中。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以往的政治哲学——包括历史主义、理性主义在内——的主要缺点是:第一,它们的批判性是机械的,没有将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它的核心议程;第二,它们是非历史、非辩证的,即它的历史主义只能陷入相对主义,而理性主义无法跳出绝对真理,没有彻底和真正地贯彻解决政治问题的实践观点;第三,以往政治哲学只能抽象地理解“理想政治状态”,而不是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政治问题的论证与争论语境中,因而只停留在解释理想范畴中而成为精英政治的独白。桑德尔误以为在公共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是源于政治问题的对话实践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差异。^③其实,任何知识公式,无论其是否贴上“批判”“实践”等标签,都不会是政治哲学的本意。政治哲学也并不存在一个理论和现实两张面孔,“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④在这里,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使人们在三个方面获得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

首先,审慎辨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人们通过政治哲学的教育与训练能够准确认识和判定政治问题。为了解决政治问题,首先就要知道政治问题是什么。确定是解决的前提,实则最为重要,其主要包含三个维度:其一,界定某个政治问题的参量。政治哲学指向的问题即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公共生活的大问题。在辨识政治问题时,第一步是利用概念框架来确定其存在与否及其存在状态。而政治哲学的建构基础就是关于政治事物的概念框架。换言之,人们经由政治哲学训练可以获得分析政治概念、定义、论证与论题的能力,并通过它们将实际问题类型化。其二,“反还原式”解析政治问题。以往的政治哲学类似于政治的物理学,无法使人有能力组织观念与议题以应对那些充满价值判定的问题;而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却使人能够从以反还原的方式解析政治问题。追求政治知识的完美是典型的问题解析的还原法,因为政治知识是有限度的,故无法像自然科学或者数学一样严格。但拘泥于日常意见也是一种“还原法”,不同之处只是其性质是消极的。而理性的人则可以通过政治哲学的训练掌握了一种反还原的多角度解析之能力,即“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的依存关系的知识。”^⑤其三,将复杂问题解构为多种可解决性的片段。列宁指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⑥,应对的办法就是抓住政治事物的主要矛盾。然而,任何政治问题似乎都是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对主要环节的判定也就非常困难。对此,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③ 桑德尔认为,一次公共哲学领域的冒险,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在我们当今的这些政治和法律争论中发现了一种哲学的机遇,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在公共领域实施哲学的尝试——将道德与政治哲学引入当代公共对话中。”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4—5页。

④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⑤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2—33页。

⑥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1页。

学认为首要是将问题链条分解成若干可以解决的片段。这就使人能够摆脱制度依赖以及公共化路径依赖,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态度,但并不陷入问题话语的沼泽,而以前面二点确立的视域与框架,反复分析、权衡与诊断。

其次,综合分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人们对于特定政治问题能够自觉运用政治哲学提供的公共议题的评论或讨论的技艺,使之得以尽可能完备的调整或处理。这一能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明确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因素和“素材”。人们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可能是宏大的——如,国家建构、民主政治等——议题,也可能是微观的——如,同性恋、环境污染或自杀——议题。但无论解决何种政治问题都必须从能够产生最佳效果的因素或素材入手。人们通过政治哲学可以尽快有效切入这些因素和素材的方式。从共性角度看,国家与公共道德是较为一般的有效因素和“素材”。众所周知,解决围绕政治问题的争辩总是会造成本种理论后果,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①,因此离开国家,人们就失去了全部历史经验,也就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经济政治条件。与此同时,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悬置正当性和重要性的判定,政治问题是“理想—现实”矛盾的产物,因此公共理性需要道德观点支撑。另一方面,探寻对重大(或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的创造性解决路径与方法。以往政治哲学认为,政治问题的解决要么是以严格限制政治争辩为路径,要么是以持续妥协为处理方法,因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提供争辩的武器(理念正义)和妥协的原则(程序正义),无论二者中任何一个,都将回归理性的精英化路线上。而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则将普通人看作解决政治问题的主体,以主体对政治事物的持续改造为基础,依此创制解决政治问题的共识,即慎议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对此,桑德尔指出,“慎议和参与的尊重提供了一种比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更为宽阔的公共理性。对于一个多元社会而言,它也是一个更加适合的理想。”^②

最后,不断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批判性思考一脉相承,对变动或复杂的政治问题的表象的解决方案能够指导有效实践,不断推进政治问题的解决。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但却有章可循。在这里,重塑政治问题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前提,其依据在于“无论如何,仅仅在逻辑的真理和定义上建立一种实质性的正义论显然是不可能的。对道德概念的分析和演绎(不管传统上怎样理解)是一个太薄弱的基础。……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解释在反思的平衡中深思熟虑的判断。”^③而确立重塑政治问题的中心地位,可以使人们接受并自觉运用问题调节能力:一方面,政治问题总是存在于实际政治生活中,它的具体形态不但多样而且变化。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某种“理论”而宣称从不同的现实中得到一个抽象的解决方案,“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④从简单的、最初的政治问题,经过确定与解决的环节,必然会发现新的否定对象,绝不存在彻底的解决。否则,任何解决方式都将最终沦为僵化的、空洞的甚至游戏化。另一方面,不论政治问题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变化,但是它始终指向与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问题虽不以主义为谱系,但仍有建构理想类型的必要,而且“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他的一切处于相异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⑤以此为据,政治哲学所提供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技艺的能力中,解决政治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应具有积极的自觉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反思的能力保障了前两种能力的实现,比如,关于政治稳定的问题,认识到均衡诉求的相对性、暂时性就体现了一种方法论自觉,因为政治生活中的个体与组织都在不停地活动,政治争辩从未停歇,这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均衡的表现,但并非说同一种均衡,这就是为解决政治稳定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辩证的观点。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

② [美]迈克尔·桑德尔:《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第227页。

③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40页。

④ 《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⑤ 《哲学笔记》,《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三、政治劝说与认同的能力是政治哲学的沟通技艺

人在社会中不断地进行着交往沟通,而交往沟通必然产生分歧与矛盾。特别是公共生活,利益的差异性与持续性决定了立场与诉求的差异性和持续性。因此,沟通和争辩才是公共生活的主要活动。由于公共生活的政治性,作为交往矛盾表现形式的争辩是公共生活表现出的常态。但是争辩与沟通是状态或过程,并不是目标。争辩的目的在于劝说(劝服),而沟通的诉求则是认同。政治哲学作为对公共生活的本质思维形式,应该使人们在争辩中有能力劝服他人,并使之在无法妥协之处仍有意愿、意识与能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政治认同。从本质上,将政治哲学就是要从抽象的观点和学说的理论理想中解放出来,只是第一步,那种停留在“考察各种现存政体或制度框架的结构、运行机制、特性和利弊,分析其衰变和瓦解的原因,并探究各种现存政体或制度架构的存续之道”^①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抽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大众化,不是人们是否能够通过政治哲学憧憬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是人们能否阐释那些本质存疑的政治概念,更不是能否发表充满价值诉求的政治意见,而是有能力从互动参与的角度不断进行政治沟通并在具体政治语境中扩大政治认同。

人们生活在话语中。在公共生活中,人始终是以第一人称身份面对不同的话语主体并围绕共同关注的话语对象而展开话语参与活动。这就是政治沟通。而以往的政治理论家往往下意识地以第三人称政治哲学认识和解释上述过程。由于他忽视了政治沟通的话语主体特征,那么由此产生的政治哲学的抽象化和无用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哈贝马斯认为,自我意味着能够从他者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言语者和听众是统一的,都存在于共有的生活世界中。换言之,政治沟通作为一种话语活动,是我们存在的背景与条件。由此,对于公共生活而言,基于政治沟通的“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②。那么,何种解释模式可能成为共识的选择呢?这不仅受到解释内容本身科学性的影响,而且需要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每个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都怀有兼具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否定意识。因此,思辨的政治哲学曾经深受欢迎,因为它提供的政治意识形态能够使人们乐于接受美好的彼岸世界,而淡忘使这种哲学理想成为现实的途径。不过,当人们开始怀疑任何个人或群体作为社会需要的代表时,科学和正当的政治理念也需要通过政治劝说而被传播和接受。在这里,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所能提供的正是面向大众的政治劝说能力。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追求使政治哲学成为现实的理论。诚然,政治哲学在学术层面不会为绝大部分的大众熟悉,不过政治哲学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理论却要进入大众。虽然学理高度不同,但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普通人都会以理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可见,人们只有具备了理论现实化的能力,才能获得政治劝说的技艺。第二,建立使人信服的论证方式。人们通过政治哲学接受的“训练”,能够将清晰的表述、精妙的论证与适当的例证很有效地整合起来。对于一个人而言,能够熟练掌握上述三者及其整合方式无疑会显示出较高的劝说水平。通过政治哲学,人们还能懂得如何建构并且捍卫自己的观点,能够冷静对待政治争辩,并自觉认识到争辩与分歧的重要性而不是急于“打压不同意见”。尤为重要的是,有能力证明相对

① 宋宽锋:《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

②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349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于其他替代方案,自身论点之所以可取性的充分理由。这些能力不仅仅是工具,也并非只有通过政治哲学的阅读和写作才能实现,而更多地通过哲学式对话(dialogue)得以实现。作为具备这一能力的典范,苏格拉底将诘问法上升到身体力行的灵魂之美,“他的推理,他的论证,已经包含了全部的力量,当他用诘问法将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人已有的观点联系起来时,已经包含了全部的力量”^①。第三,培育对不同政治方案影响力的评价理性。政治哲学是一种人文教育,即便对“政治”毫无兴致的人仍应接受政治哲学的训练,因为它不仅教人推销自己,而且导人理解他者。理解不是单纯的解释,而是评价性诠释。列宁指出:“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案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②。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政治问题,人们提出不同解释即政治方案的同时,还需要面对这些方案的差异性。“只有通过回答政治事物之自然的问题才能充分详尽地阐明对整个道德—政治领域的局限性的洞见。这一问题标示着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程度:尽管就其自身而言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这一问题对那些目的不再是指导行动而仅仅是理解事物之所是的人来说,其作用乃是提供一个楔入点”^③。因此,评价理性是后天培训的结果,即以政治争辩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任何终极性、阶段性或具体的政治方案。

将政治劝说置入理解他者,就直接说明了劝说能力需要认同能力,而认同能力来自于政治沟通。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沟通,不是人与人的言语或行为交往,而是通过“分析—综合”的关系性思维来表达观点、观念、策略的话语能力。因此,政治沟通本质上是一种思维能力,通过政治哲学所提供的人文教育则是获取它最有效的途径。只有获得普遍联系的思维,才能通过政治沟通得到政治认同。人们通过政治哲学能够提升表达力与交流力。诸如提出例子,通过充分构建与系统论述而阐发的理念等都可以使人更好地将自己的观点呈现在公共生活的话语交往中。恰恰是在这里,未经政治哲学训练和启示的人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会强词夺理、词不达意而谬以千里。不久前,《福布斯》发文指出看似“无用”的人文学位已经成为求职高科技企业的敲门砖,这是因为像政治哲学之类的人文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职业技能,即“学会真正清楚无误的撰写;学会如何能够紧跟别人的论证。”^④由此可见,充分的政治沟通能力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清晰、简洁地表达并说明一个困难(复杂)问题的能力。政治哲学首先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结果,因为从表象到本质的探索是由简入难,理解某个政治问题的深度与把握这一问题所关联的可能要素的广泛程度成正比关系。但政治沟通的关键在于提供一个“观念的先验结构”,这一结构不同于抽象观念堆砌之处就在于它是充分分析复杂问题后的话语综合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⑤第二,在尊重他人观点前提下表达个人观点。事实上,简单认同与过分差异具有相同的危害性。在以身份为基础的简单认同内,接受异议会巩固这种认同而威胁到更大范围的共识。而有些认同甚至是意见强制的结果。皮亚杰认为,简单认同应该上升为更加积极的存在方式,即一种超越身份与道德同情的认同路线。这条路线“是相当真实的:它不会不朽、不变或超越人们创造的其它事物。事实上,讨论分化的不和谐可以引导我们忽略那些有力的对抗力量:冲突也许有利于认同的产生,但冲突也可以成为认同群体的力量。”^⑥在这里,跳出简单认同的身份限定,不是人的本能而是训练的结果,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接受他者,但前提是他通过教育理解了接受他者并不等于自我弱化,相反是获得更强自我确认的有效策略。第三,运用多种策略传达相关

① [美]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86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37页。

③ [美]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第82页。

④ G. Anders, “That ‘Useless’ Liberal Arts Degree Has Become Tech’s Hottest Richet”, *Forbes*, 2015-07-29.

⑤ [瑞士] 皮亚杰:《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信息。实质上,这种技艺是指人们具备管控公共信息的能力。这包括:将含有公共信息的数据加以分类、编译与分级的能力;对公共信息加以评估,进而使之进入问题解决流程的能力;在大量的公共信息载体存在的情况下,将所需信息精确定位的能力;能够具备创造性视野,并以此指导公共信息搜寻的能力;为了减少公共信息在传播中的耗散性,应具备的概念抽象能力;“全局观”能力,即不因具体信息的凸显而忽略其总体性;在不相关的素材或语境中,辨析捕捉有价值的公共信息的能力。

当然,政治哲学所能包含的政治技艺不局限于以上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技艺所提供公共生活的能力也在不断发生变动。但这三个方面是政治哲学得以作为公共生活技艺而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其他技艺产生的原点,是人们通过政治哲学而必要获得的能力。

总之,“作为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个部分,政治哲学在为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提供源头活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人类政治进步的历史证明,政治哲学不仅提供公共生活的种种技能,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哲学分支。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并不是要抹去它的“哲学光环”,而是要让人们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有能力争辩而理解政治事物。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指引——尝试将有资格的公民,或更准确地说,将他们有资格的后代从政治生活引入哲学生活”^②。抽象的政治哲学根本从话语结构上就是不成立的。对于民主国家的建设,民主由理念设计到国家建构不仅需要“民主的制度化”,而且需要人特别是公民的公共化,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而言,人们对政治哲学提供的公共生活技艺的自觉运用将是实现中国式民主的前提条件。在这里,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始终是实现优质民主的哲学话语基础。

(责任编辑:杨嵘均)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a Practical Art of Public Life

QI Guang

Abstract: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not only the theories embodied in the great works of philosophy but also a guide to our public life. As a matter of fact, it has become an art of discussion or debate over public affairs. Therefore, political philosophy today needs to be freed from the ideology only regarding it as a theorization of ideal state of political affairs. In public life,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supposed to be a reflection on the actual state 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perfect state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 practical a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kind of reflection or explanation. The practicalit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ies in providing people with the abilities to make judgment, decision and assertion and to pledge obedience in order to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quest for neutral political truth. That is, what used to be cited as evidence of transcendence above the pursuance of consensus-oriented political science or result-oriented political philosoph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act that it enables people to truly acquire, among others, the abilities or skills to think critically, solve problems constructively, explain completely, communicate inclusively,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systematically in public life. Consequently,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no longer a fantasy edifice for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polemic nature of political affairs, but also realizes people's value pursui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ideal political state.

Key words: public life;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debate; art; justice

①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第6页。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第81页。